

困惑与警示:为什么官员难拒迷信?

——国家行政学院针对县处级公务员的专项调查结果令人吃惊

本报驻京记者 杨丽琼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程萍的办公室里,整齐地码放着几摞调查问卷,经过统计分析,专家得出一个让人意外的结果:在我国的县处级公务员中,迷信者为数不少。

这些打印在A4纸上的调查问卷来自17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每份长达13页,共38道大题,每道题可供选择的答案至少有4个。在问卷上打勾答问的,都是在省级行政学院接受培训的县处级公务员。

这个调查结果是怎样得出的?它的准确度如何?目前社会上的迷信之风和官员的迷信有着怎样的关联?近日,记者采访了这个调查课题的主持人程萍研究员和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郑念。

“在中国,一切都喜欢‘8’。”德国《世界报》一篇文章曾如此描述。这已经变成不少中国人的潜意识了。如今数字迷信成风,不仅仅限于电话号码或汽车牌照了。郑念告诉记者,曾有人对长江上迄今建成的三十多座桥的相关数字作过“考证”,这些特大桥梁的长度、跨度、塔高、通航净高以及开工、竣工时间等,往往刻意凑合6.8.9等所谓的吉利数字。有的主跨采用两个连续348米,有的主跨388米、618米、628米、648米、888米、2088米等等。他说:“难道桥梁设计者测算的数字就那么凑巧吗?其实是决策者定的。”数字迷信与科技居然也联系在一起,实在耐人寻味。

近年来,求神拜佛、占卦算命、建庙修祠很盛行。从南到北,从东部沿海省市到西部省区,到处都有“大师”为人们“点拨风水”“请神去晦气”“占卦预测”。“猪娃”扎堆生,还得花重金请“大师”给“金猪宝宝”取避“刀、力”偏旁,带“米、豆”偏旁的吉祥名字;结婚测八字,逢病遇灾、升学求官祈祷许愿,本命年系红腰带,日常生活中戴护身符、穿幸运色……

尽管科技发展已大大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但在中国流传数千年的传统迷信并没有随着科技进步、教育普及而消失,反而日益在社会生活中弥漫。就连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使占卜算命找到了新的手段,披上了“科学”的外衣。

针对社会上迷信现象的现状,程萍在她的“我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养调查与分析研究”的问卷中,设计了这样两个问题:

“您对以下几种预测人生或命运的方法相信吗?是很相信,还是有些相信?是不相信还是不知道?”(所列举的“方法”包括:求签、相面、星座预测、周公解梦。)

程萍的问卷在行政学院的课堂上请学员们当堂完成,结果他们中竟有多达28.3%的人称自己“很相信”或“有些相信”相面。

与2005年中国科协举办的“第六次全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数据对比,这个比例高于普通老百姓(26.7%)。在这些县处级的公务员当中,回答相信“周公解梦”和“星座预测”的比例也分别达到了18.5%和13.7%。

长期从事科普工作的郑念研究员认为,程萍的调查结果应该是

为什么社会上的迷信之风会越刮越烈?本应“信马列”的一些公务员也身陷其中?郑念从历史、社会等原因作了分析。

“传统世俗迷信在中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远古时,就有传说中的伏羲氏“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旁观鸟兽身上的花纹,画八卦而治



本版插图 田红

12 县处级公务员信“相面”比例:28.3%

可信的。现实生活中,迷信活动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中也有市场,有的部门把菩萨供奉到了办公室,个别工商部门为所谓的咨询(预测)公司办理执照,有的大学计划设立“风水课”,要培养现代风水先生。官员沉溺于迷信的不少见,尤其是贪官,一旦案发,与贪腐罪行一同被揭露的往往还有他们从事的迷信活动。

原福建省政和县县委书记丁仰宁,上任前曾到庙里抽得一个“上上签”,说他是“百万富翁”。丁仰宁对此深信不疑,于是他100个放心,大胆收受贿赂、卖官攫财。在他任内的政和县,也掀起了修庙、拜佛的高潮,小小县城周围有十多座寺庙香火不断。前去叩拜以保佑

自己当官发财的人中,不乏当地各级官员及其亲属。

一天夜深人静时,山西省交口县县委大院灯火齐明,数十名党政干部齐跪香案前,“代表县委县政府”埋下“镇邪物”和“升官符”。这场闹剧源自该县主要负责人认为自己升不了官是因为县委大院“风水”不好,他们恭请来的“风水师”断言,县看守所和县人大办公楼高出县委办公楼,须通过重修看守所、修牌楼、在县委大院中心和四角埋“镇邪物”和“升官符”才能“破解”。

郑念说,因官员迷信而发生的种种匪夷所思的荒唐故事不胜枚举:山东泰安原市委书记胡建学,被“大师”预测到“有当副总理

的命,但命里还缺一座‘桥’”,于是下令将耗资数亿元的国道改线,在水库上架起一座桥;河北国税局原局长李真被风水师预言“5年内将成封疆大吏”,心花怒放一掷8000元;不久前,山西省粮食局原局长高志信违规挪用国家粮食储备库资金修建宾馆,还在宾馆旁盖了一个“粮神殿”,里面供奉了3尊神像。

郑念曾暗访过一些长期搞迷信活动的术士。术士们向他吹嘘,找他们算命、看风水的人中,领导干部占很大比例,而且越来越多。大小官员们往往开着小车直接上门“求教”,为了不让熟悉的人遇见,有的本县、本乡的领导到外县、外乡去求签算卦。

13 洋迷信与土迷信相互渗透

天下”。到商代,发展到设立卜官的职位,大到出征、修建、祭祀、禅让等国事商定,小到百姓日常耕作、婚娶、狩猎,都要用兽骨、龟甲占卜,请示天意。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迷信的内容越来越多,占星、占梦、风水、求签、巫术、看相、算命、测字、星象、择吉、符咒……这些迷信术语和活动在民间广为流传,在世俗生活和人们心理中沉淀,极其顽固。

当今社会转轨带来了诸多压力,人们不得不面对求职、婚姻、升学等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追求的目标变得迷茫,而对金钱和物质的欲望又大大提高,于是往往求助于“神灵”保佑。

郑念说:“‘三院两区’——医院、法院、学院及开发区、旅游区门前看相算命的‘大师’特别多。他们

跑到医院门前,是因为病人及其亲属都希望早日康复;等候在法院门前,是因为原告被告都希望自己胜诉或降低惩罚;学院也成为他们的目标,是学生都希望自己能顺利升学和就业;而开发区里的大小老板们面临着难以把握的市场竞争,总是感到前途难测。算命先生到这些地方说些吉利的话,预测打官司前景和升学就业,很容易骗取钱财。这一切说明了什么?说明人的心态有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又出现了国外的洋迷信与国内土迷信相互渗透的新特点。”郑念对此非常担忧:星座预测和解说之类的洋迷信现在在青少年中很流行啊!有个大学生是忠实的星座迷信者,她毕业于师范院校,但互联网上的星座预测说她是生意人。于是她找工

作时就避开教师招聘,只找公司企业求职,结果四面碰壁,错过很多教师工作岗位。有个博士,星座预测他必须往南边去发展,结果他从东北到了上海,可还是没有发展好。他不是从自身找原因,而依据星座觉得自己还应当去更南的地方,去年去了广州,但情况还是很糟糕。最近他决定到更南的地方——海南岛去开拓事业了。这样的博士,你对他说什么好呢?

郑研究员指出一种很可笑的现象:“占星术在我国明朝以后就已逐渐衰落了,近年不仅‘越洋’回来,还渐有流行占据主要地位的趋势。如果你向一个年轻人说‘巫医跳大神能治好病’,他会说你是傻子。但他对星座的诸多‘理论’深信不疑,可以滔滔不绝给你传授‘12星座及运程’。”

记者手记

在程萍的调查中,对“预测”的“灾难”有恐惧心理的公务员为数不少。程萍说,他们至少是持有“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当被告知“您最近将遇到大灾难”时,有17.6%的公务员表示要去“查询有关的书籍或询问亲友”,有7.1%的公务员称要“按预测者提供的办法去避免灾”。

记者发现,这些县处级公务员的文化水平都不低,拥有大专及以

上学历的接近100%,其中20.0%还有着研究生学历,35.2%的人有着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这种迷信现象实在需要深刻反思。

这项调查是程萍为了配合自己的教学工作,于2006年第四季度分别在重庆、河北、山西、内蒙古、江苏、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贵州、青海、甘肃以及沈阳、深圳、西安等省市区和副省级城市的行政学院进行的。两位研究员在大量的调查中感慨颇多,他们一再向记者强调,少数官员迷信,肯定会对迷信在大众中

的流行起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这些人身份特殊,他们信奉迷信不可避免会在社会上起“不良的示范效应”。

中国共产党党员应该是无神论者。全社会倡导“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的荣辱观,党政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尤为重要。

与程萍的调查结果不谋而合,《求是》杂志今年五月刊发表的一篇文章发出警示:“一些党员不信马列信鬼神、不信组织信个人,值得高度注意。”